
合肥西乡周氏与周本淳及桐城派之关系考论¹

张强

(淮阴师范学院运河与漕运研究中心, 江苏淮安 223300)

【摘要】周本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其人生经历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寻求自强的历程大体上相对应。太平军入皖时,周本淳先生的四世祖周盛华率六兄弟办团练。周盛华等战死后,其弟周盛波、周盛传继续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招募淮军时,建立了周盛波和周盛传率领的盛字营。在征伐太平天国及捻军的过程中,盛字营脱颖而出成为淮军的中坚力量。周母为择校煞费苦心,目的是让周氏兄弟走出狭隘的私塾天地,接受正在兴起的新式教育。从入养正小学读书再到考入浙江大学,周本淳先生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在家庭的影响下接受了桐城派的治学方式及经世致用的思想。桐城派的考证、辞章之学培养了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入世进取的精神铸造了周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耿直性格。桐城派一向有居官授业、家族传嬗、朋友切磋、同僚服膺等传统,周氏家族接受桐城派,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一定的关系。如淮军领袖李鸿章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乡。这样的前提下,周本淳先生自然会在家风的影响下关注桐城派。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校点古籍;二是诗学研究;三是考证古籍中的错讹;四是诗词创作。四者相辅相成,反映了周先生治学的不同层面。周先生胸怀广阔,有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的坚定信念,有深厚的小学功底,治学上承章黄学派,其诗词创作是周先生解决古代诗学问题的重要武器。

【关键词】周本淳;合肥西乡周氏;周氏宗谱及家风;桐城派;淮军;古籍校点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5-0052-09

周本淳先生(1921—2002年)是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人生旅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第二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以前;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去世。从时间节点上看,周先生的三个人生阶段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寻求自强的历程大体上对应。可以说,变幻莫测的风云与周先生的人生拧结在一起,给人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和不尽的想象空间。

周先生出生于安徽合肥西乡的一个耕读世家。追溯历史,合肥西乡周家是周平王次子姬烈的后人,在繁衍壮大的逐步形成了汝南、沛县、合肥西乡等三个居住中心。如《周氏宗谱》有“我庐州西乡周氏就乃由汝南周氏繁衍而来(其间堂号为爱莲,一直沿用到清朝,后因皇帝恩赐,更名为报本堂)。明朝初年由于战乱,始祖兴旺公自江西瓦家坝迁至江

南江省庐州府(现在的安徽省肥西县紫蓬镇)至今六百多年”^①之说。

¹ 收稿日期 2017-06-20

作者简介 张强(1956-),男,江苏流阳人,教授,文学博士。

周本淳先生的四世祖周盛华有兄弟六人。周盛传记载道：“予先世居合肥六十墩，同产兄弟六人，予次第五。家有田数顷，力农自食。”^②太平军经略皖北时，周盛华率领周氏兄弟办团练自卫。史称：“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弟六人，团练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1]12082}（《清史稿·周盛波传》）当时，皖北合肥一带的团练声势最大，其中，紫蓬山的周盛华团练与周公山的张荫谷及张树声父子团练、大潜山的刘铭传团练等合称“三山”，三山互为犄角，相互支援。与此同时，他们又联合潘鼎新等团练筑堡，共同抗击太平军，如史有“粤寇扰皖北，（张树声）以稟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1]12496}（《清史稿·张树声传》）之说。

后来，周盛华和三个弟弟不幸战死。如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盛波以乡兵剿贼，兄弟六人，四殉王事。”^[2]朱孔彰亦记载道：“刚敏公为将，法令严整而善得士心。兄弟六人，其四死于王事，惟与弟盛传积功至专阃。”^{[3]275}《清史稿》亦称：“兄盛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1]12082}（《清史稿·周盛波传》）治清史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清史列传》“稿本来源就是出于前清国史馆历朝纂修的《大臣列传》”^[4]民国初年，朱孔彰曾任清史馆编修，参加《清史稿》的编撰。更重要的是，编撰《清史稿》的学者大部分与周氏兄弟为同时代人，有的甚至相识，因此，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

史有“五年，兄盛华阵亡”^{[1]12084}（《清史稿·周盛波传》）之说，又有“四年二月，三伯父殉难”^③之说，周盛华何时遇难，多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周盛传记记录咸丰五年大事时写道：“二月初四日，贼众破埧入。时予与六弟先奉太夫人居他所。三兄督练守御，力不支，犹手刃数贼，乃被害。……四兄力战突围出。”^④周盛传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据此，周盛波战死于咸丰五年二月当不成问题。此后，其弟周盛波、周盛传负责抚养周盛华等四兄弟的遗孤，并率众与太平军对抗。

同治元年（1862年），为扩大兵源，曾国藩令掌机要的门生李鸿章到皖北招募淮军。史称：“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撤弟鹤章总全军营务。”^{[1]12012}（《清史稿·李鸿章传》）李鸿章受命后，传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吴长庆等到安庆拜见曾国藩。经此，由血缘关系及乡邻组成的皖北团练整编后成为淮军。史称：“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募成军，曰盛字营。”^{[1]12082}（《清史稿·周盛波传》）为了组建一支强悍的淮军，李鸿章采取“就所部选募成军”的方略，建立了周盛波和周盛传率领的盛字营，张树声率领的树字营、刘铭传率领的铭字营、潘鼎新率领的鼎字营、吴长庆率领的庆字营等五大营。

五大营成军后，赴上海受训，学习新式军械火枪火炮的使用方法。赵尔巽论述淮军战斗力时指出：“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骁悍。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藩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1]12090}（《清史稿·程学启传论》）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以后，出于“欲全湘军”等私心，曾国藩提出用淮军“平捻”的主张。从此，李鸿章及淮军走向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征伐太平天国及捻军的过程中，周盛波、周盛传领导的盛字营因骁勇善战，很快成为淮军中战斗力极为强悍的部队。如周家驹编辑其父周盛传的遗著时写道：“时以铭、盛、鼎、树并称，号‘淮上四军’。公又与刘壮肃齐名，有‘肥水二传’之称，因先公与壮肃皆名传也。”^⑤同治二年六月，在李鸿章的亲自过问下，建立以周盛传为主将的传字营。史称：“六月，李公以抚

² ①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一《山周合族同修家谱序》。

②周盛传《磨历纪实·自叙》，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9页。

③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二《行述》。

④周盛传《磨历纪实》，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14-15页。

标亲兵千五百人改为传字三营属公，公始独将一军。是时，兄盛波军号‘盛军’，刘公铭传军号‘铭军’，公由漂阳偕铭、盛二军进攻广德州，拔其城。”^{[3]272-273} 灭捻之后，周盛波“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1]12083}（《清史稿·周盛波传》），周盛传成为盛军的主将。朱孔彰评价周盛波（谥号刚敏）时写道：“捻匪平，与弟盛传言曰：“吾二人同乞归不可，弟在军操练旧部，备缓急之用，以报君父。”，故刚敏家居养母十余年，同时名卿或复出，坚辞不行。及海上有事，奉诏征，投袂而起，不遑恤私，其深明大义如此。”^{[3]275} 经此，周盛传独掌盛军，鼎盛时马步军多达三十二营。

经过锤炼，盛军成为淮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这中间，周盛波、周盛传官拜一品，周氏家族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如同治九年（1870年），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在老家旧堡的基础上建成周老圩。周老圩是一座有防御功能的圩子，楼台亭阁点缀其间，可供居住的房屋有四百五十多间。此后，周氏家族又在周老圩的周边建成康湾圩、新圩、小圩、杨圩、罗坝圩、海螺冲圩等圩子，据统计，这些有防匪防盗功能的圩子极盛时，户丁达万人以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式陆军是晚清政治中的大事。其实，小站成为满清王朝训练新军的基地，是在周盛波、周盛传加强津沽海防的前提下实现的。可以说，周氏兄弟领导的盛军是满清筹办北洋新军的基础。具体地讲，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后，周盛传奉命进驻马厂（今河北沧州青县马厂）。史称：“时李公移督直隶，疏调公所部屯卫畿辅。十年，营于青县马厂。十二年，奉檄遍勘海口情形。公建议以故明之新城上蔽津郡，旁临大沽、北塘附近扼要，旧有土城已圯，炮台亦形逼仄，不可用，请改筑。遂筑内外城各一，城内大炮台三，城上环置小炮七十有一，此外兵房、药库、仓廩、义塾及城外沟河桥闸准备。”^{[3]273} 驻防期间，周盛传主要从四个方面采取了加强海防和拱卫京畿的措施：一是加固大沽新城（今天津塘沽东南）；二是扩建炮台；三是兴建从马厂到大沽新城、的大道；四是沿马新大道建驿站，形成了四十里一大站、十里一小站的布局。五年后即光绪元年（1875年），周盛传率部进驻潦水套并操练新军。潦水套是大沽新城以西的第十一个小驿站，军士习惯上以“小站”相称，经此，小站成为满清操练新军和津沽海防的指挥中枢。从这样的角度看，周盛传在小站练兵实开满清小站练兵之先河。

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小站成为津沽之间的战略要地。在周盛传进驻之前，小站即潦水套是一片盐碱地；进驻之后，周盛传奉命屯田垦荒，通过开渠建闸引南运河和海河水压碱、鼓励百姓围垦等，建成六万多亩的军垦稻田，十三万多亩的民垦稻田。经此，小站成为津沽著名的粮仓。在这期间，周盛传积极地建造商铺和发展商贸，为小站成为津沽之间的人声鼎沸的商埠创造了条件。

光绪十年（1884年），还乡侍母的周盛波奉命在淮北招募淮军。史有“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1]12083}（《清史稿·周盛波传》）之说，经过训练，五千精壮士兵开赴天津，成为加强津沽海防的重要力量，如史有“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1]12090}（《清史稿·程学启传论》）之说。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因母丧悲哀过度不幸去世。周盛波本打算居家守孝，然朝廷“夺情”，故重掌盛军并驻守津沽。光绪十四年（1888年），唐山至芦台铁路的延长段津沽铁路建成，小站成为津沽铁路不可或缺的站点。稍后，周盛波率部建开平（今河北唐山开平）至山海关的铁路，如史有“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1]4429}

（《清史稿·交通志一》）之说。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时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通车。小站成为满清训练新军的基地，除了与地理位置相关外，还与周氏兄弟兴建马新大道、津沽铁路、开平至山海关铁路相关，与周氏兄弟加强海防在小站屯田、练兵、发展商贸等相关。

⑤周家驹《跋》，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1287页。

1921年，周先生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新旧交替时不断分化和整合的年代。这一时间上距辛亥革命成功仅有十年，十年是百废待兴、除旧布新的十年，在经历恢复帝制和再造共和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民党通过北伐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他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面对诡谲多变的形势，周母吴元玲担负起培养周氏兄弟周本厚和周本淳的责任。

据《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从1912到1949年，在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地诉诸武力的较量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35岁。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诉说的道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救万民于倒悬之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周本淳先生的父亲早亡，其母吴元玲担负起培养周氏兄弟周本厚和周本淳的责任。吴家是合肥东乡的望族，吴元玲的父亲曾一度出任道州知州。面对列强步步进逼、军阀混战等错综复杂的局面，周母吴元玲下决心将两个孩子培养成有用之才。在这中间，周母以孟母三迁为榜样，将七、八岁的周氏兄弟送到距家百里的养正小学读书。养正小学是皖北首屈一指的以传授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办在合肥东乡六家畈，六家畈是吴家的祖居地，为培养其子弟，吴氏家族即周先生外祖父的族人兴办了这所小学。

周母为择校煞费苦心，目的是让周氏兄弟走出狭隘的私塾天地，接受正在兴起的新式教育。客观地讲，这一举措是很有知识眼光的。经此，以入养正小学读书为起点，周氏兄弟走上了求学、放眼世界、探索人生的道路。

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1938年，长兄周本厚投奔新四军。为了不拖累家庭，周本厚改名“萍”，因是老大，故取名“周伯萍”。以“萍”自名，与曹丕《秋胡行》、文天祥《过零丁洋》两诗叙写的浮萍意象有直接的关系。如《秋胡行》有“泛泛绿地，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5]句，后来，随风聚散的浮萍引申为漂泊不定、浪迹天涯之意。时至南宋末年，文天祥挖掘其意象，强调了浮萍漂泊不定又遭“雨打”的孤苦形象。如他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震古烁今的诗句。周本厚改名投笔从戎意在明志，表达精忠报国的死士之心。当弟弟周本淳也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时，周伯萍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尽忠，你为家尽孝。从此，兄弟二人远隔千里，开始了各自的人生旅途。后来，周伯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部长及全权处理非洲事务的外交官；周本淳先生则担负起侍奉老母的责任，直到92岁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讲，尽忠虽然壮烈，但多有荣耀，更何况，负剑报国终有成功之日。与之相比，尽孝则是件默默无闻的事。特别是“举孝廉”不再成为选官制度，尽孝遂消解在忠君爱国的大义之中，其价值和意义似乎被更多的人遗忘。

从入养正小学读书再到考入浙江大学，周本淳先生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新式的，不过，考察其思想行为的运动轨迹，周先生是以士的入世进取精神担当社会责任的。挖掘其思想行为运动的轨迹，则与家教及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认为，桐城派是清乾隆年间兴起的散文流派，作文时以明代唐宋派归有光等人的古文为典范。如在桐城人戴名世的悉心指导下，桐城人方苞（字灵皋）成为桐城派的开山鼻祖。戴名世叙述往事时写道：“盖灵皋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6]此后，刘大櫆继承方苞之学成为桐城派的重镇，姚鼐继承刘大櫆的衣钵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再后，桐城派后学将方苞、刘大櫆和姚鼐尊称为“三祖”。姚鼐感慨地记载道：“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7]桐城派的文章成为天下师法的对象，固然与其有精美的艺术形式相关，更重要的是，桐城派作文以“载道”为价值取向，建立了以经学为“道统”的思想体系。在古人看来，文是“道”的载体形式，经世致用是作文的灵魂。如明代唐宋派师法唐宋八大家，是因为八大家的古文是“文以载道”的典范。如明代唐宋派主将王慎中论述道：“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8]这一论述大体上道出了唐宋派注重经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倾向。

在师法唐宋八大家的过程中，桐城派对归有光（号震川）经世致用的思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归有光治学主要从洛学即洛阳程颢、程颐理学和闽学即福建朱熹理学入手，在此基础上，探究六经及汉学。如清初钱谦益论述道：“先生钻研六经，含茹

³ ①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九》，《遵岩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嘉靖四十五年刘溱刻本。

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元本。谓秦火已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8]这一说法准确地概括了归有光研治六经从程朱理学入手的基本情况。康熙年间昆山知县董正位亦论述道：“余读先生之《易图论》、《洪范传》，知其经学深邃。于《马政志》、《三途并用》诸议，知其世务通达。而浚吴淞江、三吴水利诸书，今方行其说，殆东南数百年之利。”^[9]在这里，董正位撇开归有光作文时师法唐宋八大家的技巧不论，强调了归有光研习六经旨在为现实服务的精神。进而言之，钱谦益、董正位生活的年代早于桐城派，他们充分肯定了归有光作文以经学为逻辑起点的做法。

方苞以归有光为宗，作文以“义法”为灵魂，包含了对经学及程朱理学的体认。方苞论述道：“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0]这里所说的“义”，是指作文时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内核。这里所说的“法”，是指作文时的形式和技巧应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刘大概论述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11]刘大概丰富了方苞的“义法”理论，强调作文时“神为气之主，与‘以理为主’的统一，强调“义理、书卷、经济，为“行文之实”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即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内核。

在方苞、刘大概的基础上，姚鼐将作文之法总结为以“义理”为核心的“三端”。如他论述道：“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弊者之难得欤？”^[12]这里所说的“三端”，以“义理”为核心。“义理”初见于《礼记》，如《礼记·礼器》有“义理，礼之文”语，后经程朱理学的阐释，“义理”成为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姚鼐以这一概念阐释“学问”时，明确地表达了以程朱理学为评判是非标准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义理”，是指在明白畅达、富有韵味的行文中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考证”，是指用确凿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论述问题；“文章”，是指作文时的讲究辞章即字句章法。从这样的角度看，桐城派受到追捧，是因为他们通过精心地研究唐宋派笔法及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确立了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己任的作文之法。进而言之，关注桐城派除了需要关注他们讲究辞章的作文之法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以文章承担的入世进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使命。曹丕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之说，桐城派关心的作文之法，在本质上与曹丕所说的“文章”相通。

近人研究盛军及周氏兄弟时，大都认为周盛波、周盛传尚武少墨。不过，从周盛波、周盛传与时人往来的书札中当知，这一说法多有欠妥之处^①。儒学是周氏家族培养子弟的逻辑起点，重视文教是周氏长期累积的家风。如周盛波之子周家谦博通经史，其著《六分池馆随笔》、《槃盒诗钞》等表达了以儒家是非为是非的观点。又如周盛传之子周子昂在老家兴办光宗学校，专门培养周氏族人。在这中间，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给周氏家族以重要的影响。如周氏家族第七次修订宗谱时，请陈澹然（1859-1930年）为宗谱撰文。陈澹然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人物，熟悉湘军、淮军故事，与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黎元洪、袁世凯等多有交往，曾搜集湘军史料撰写《江表忠略》。赵尔巽任《清史稿》总裁、桐城派马其昶任《清史稿》总纂时，陈澹然为分纂。又如桐城派后学、曾国藩弟子吴汝纶曾书写挽联吊唁周盛传^②，等等。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成功后，注重文教，乃至周氏家族与近在咫尺的桐城派人物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在这中间，以周盛波、周盛传建功立业为标志，周家经历了由耕读之家到建立军功成为“中兴将帅”的变化，不过，他们似乎更愿意恢复耕读之家的本色，走经世致用之路。从这样的角度看，续修

① 周盛波书札可参见博宝拍卖网公布的书影，周盛传书札可参见周盛传撰、周家驹续辑《周武壮公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② 参见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据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复印，第1250页。

宗谱时请陈澹然撰文绝非偶然之事，这里面隐藏着周氏家族推崇桐城派的意图，从一个侧面传递了周氏家族以经世致用为治家理念的信息。陈澹然为《周氏宗谱》撰文的落款为“民国八年岁次己未夏月桐城陈澹然撰”（抱本堂《周氏宗谱》卷三《事略》），这一时间比周本淳先生的出生时间早两年，据此，桐城派后学与周氏家族的关系应影响到周本淳先生的治学方式和人生态度。

细绎文献，周本淳先生有可能从三个方面接受桐城派的治学方式及经世致用的思想。

其一，桐城派一向有教授乡里、主讲异邑书院的文化传统。在“学者多归向桐城”^{[13]204}的过程中，桐城派的思想主张早已传播到全国各地，进而出现了以阳湖（今属江苏常州）人杨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以严复、林纾、陈衍等为主的福建侯官派。合肥与桐城相邻，自然是桐城派思想传播的重要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氏家族及周本淳先生势必关注到桐城派的学术成果。事实上，桐城派一直是周本淳先生关注的重点对象。如《震川先生集》是周先生走上古籍校点之路时校点的第一部古籍，透过其整理归有光著作时关注桐城派的作为，当知周先生整理归有光著作与关注桐城派有直接的关系。如周先生校点《震川先生集》时，特别提到桐城派之祖方苞对归有光的评价。又如周先生写道：“在散文风格上，归有光上继司马迁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传统，下开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散文的先河。”^[14]这虽然是评论归有光在文学上的贡献，但强调了归有光对桐城派散文的开启作用。此外，周先生介绍归有光生平事迹时，特意强调了归有光在长兴县任知县时的作为，肯定了归有光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如果以此为结合点，那么，周先生对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所体察的。如周先生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时指出：“陶渊明写过《自祭文》和《拟挽歌》诗，被人称为旷达。袁枚因为相信胡文炳说他七十六岁该死的话，就预先做自挽诗，并且广泛征求朋友预寄挽诗属和，姚鼐等都写了。”^{[15]9}在标校袁枚诗文时，周先生除了注意到姚鼐为袁枚写的《墓志铭》之外，同时又有“姚鼐谓袁枚文章‘通乎古法’”^{[15]12}等语，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透露了周先生精通桐城派之学的信息。

其二，周氏家族以程朱理学为立家之本，与桐城派推崇程朱理学有共通之处。如周氏家族十一世续修家谱时，议定了“国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章崇法守，理学绍心传”（抱本堂《周氏宗谱》卷四）的班辈排行方式。古人修订家谱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意图，一是弘扬家风，追思先祖业绩；二是续补旧谱没有记载的家族新发生的大事，包括家族生死存亡时的大事以及光宗耀祖的大事件；三是家族在自身繁衍的过程中存在着向外迁徙和另立门户的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在修订宗谱时理清线索，不忘根本；四是续补或规定排行班辈，旨在强调宗族血缘关系；五是根据排行班辈的字义，表达家族的价值取向和规定家族发展的方向。从周氏家族续谱的行为中不难发现，周氏家族是以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为本位和治家方略的。其中，“国有文方盛”规定了周氏家族以《诗》、《书》传家为基本思路；“家行孝本先”规定了周氏家族以孝为先的家风；“典章崇法守”道出了周氏家族恪守儒家经义的家风；“理学绍心传”道出了周氏家族与宋代理学的关系。以此为逻辑起点，当知周氏家族续修谱时表达以儒学为立家之本的诉求，以宋代理学治家的理念。周氏十一世续谱时正是桐城派主导文坛之时，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宗强调经世致用与周氏续修宗谱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从这样的角度看，周本淳先生接受的教育虽然是新式教育，但家庭教育则是传统的，甚至与桐城派治学及经世致用的思想多有联系。具体地讲，周先生听从长兄的意见，将侍奉老母视为终生的责任，是由家风决定的；走上治学之路，与桐城派注重义理、考据、辞章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凛然正气痛斥时弊，则是治学以经世致用为本位的生动写照。进而言之，桐城派的考证、辞章之学培养了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入世进取的精神铸造了周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耿直性格。

其三，周盛波，周盛传有可能从曾国藩、李鸿章那里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曾国藩是桐城派后学，以姚鼐的私淑弟子自称，李鸿章是曾国藩入室弟子。周盛波、周盛传带领的紫蓬山团练在整编为淮军的过程中，分别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节制，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从他们那里接受桐城派的思想。曾国藩论述道：“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概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书昌永年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兴废，亦各有时，其命也软哉！”^{[13]204-205}又论述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6]在赞同姚鼐之学的过程中，曾国藩强调了“经济”这一经世致用的内容。

从本质上讲，“经济”与“义法”、“义理”相通，曾国藩将其单列，目的是为了突出经世致用的内容。此外，曾国藩所说的“经济”与刘大魁所说的“经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这样的角度看，曾国藩的“为学之术有四”，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强调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思想。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中举人后，李鸿章奉父命以“年家子”的身份到湖南大儒曾国藩的府上受学。曾国藩因病居北京城南报国寺休养时，李鸿章“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17]。从曾国藩以桐城派及姚鼐为师法对象，强调“经济”之学，再到李鸿章“讲求义理之学”，并按曾国藩的治学理念编校《经史百家杂钞》，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周氏兄弟以及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思想行为。周盛华及三个弟弟战死后，周盛波、周盛传成为周家的顶梁柱，担负起抚养周盛华及四兄弟遗孤的责任，在他们接受桐城派思想的过程中，势必要给周氏家族以深刻的影响。此外，桐城派一向有居官授业、家族传嬗、朋友切磋、同僚服膺等传统，淮军领袖李鸿章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乡。这样的前提下，周本淳先生自然会在家风的影响下关注桐城派。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推翻建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21年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走过了28年，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用三千万人头打下了江山。面对大好形势，在南京第一中学供职的周先生满怀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开始了研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遗憾的是，一个满怀着赤子之心的希望祖国强大昌盛的读书人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具体地讲，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动力的指示》之际，周先生刚刚完成《离骚浅释》书稿。周先生一生追求光明，有入世进取的宏大胸怀，既然党号召参加整风，那么，自然要全身心地投入。周先生的公子周先民教授叙述这一往事时写道：“（周先生）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自恃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出于公心，敢于知无不言。得知一位非工会会员被院方推荐为工会主席后，遂在党总支门口贴出大字报表示异议。又向领导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党之领导应体现在执行党之政策方面，而不一定表现在领导干

部非党员不可。二是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固然不错，但对具体单位来说不能一概照套，比如南京一中肃反时所抓皆错，后来都放了并赔礼道歉，而反动标语却没有破案，这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三是认为毛主席在山东阳谷县养猪问题的批示上所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有误，《水浒》上说武松为河北清河县人氏。主席一时疏忽，报纸应动点脑筋提醒一下。”（周先民《周本淳先生年谱》）没料想，因“说毛主席有错误”等三条罪状，周先生成了右派。这一飞来之祸把周先生震晕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尽管如此，周先生始终抱着搞错了的想法继续为人民服务，并以屈原激励自己，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周先民回忆父亲的事迹时写道：“先父为诗学杜、学苏，为人上亦效法两位先贤，不论穷达，皆既能独善其身，又欲兼济天下，忧国忧民是其不变的情怀。”其实，周先生的精神支柱是屈原，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的人生追求支撑着他。如在困境中，周先生以屈原为榜样，学古人以《离骚》佐酒，期待着党的解救。如他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碰壁经年未褪狂，何须竿木始逢场。为牛为马随呼应，是鬼是人自主张。偶放强颜争曲直，难随众口说雌黄。莫嫌雨雾凄迷甚，暖眼当空有太阳。”^①这首诗，袒露了周先生在艰难之中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旷达。

因打成右派，周先生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如落户江苏淮安县平桥公社孟集大队陆庄生产队时，全家八口挤在两间茅草屋中，周先生除了要参加各种繁重的农活外，还要担负起全家生活的责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夺去周先生孩子的性命，因缺药少医，三女不幸离开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最大的不幸^②。然而，周先生没有被击垮，继续面对惨淡的人生，相信国家一定会纠正错误的。

改革开放以后，周先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教学和古籍整理工作中。在这中间，应约校点了《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唐才子传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重订了《茗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古籍。此外，应程千帆先生之请，主持了《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的审订工作。《全清词·顺康卷》共二十册，工作十分繁重，周先生不计名利，纠正了编纂过程中的大量错误。

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校点古籍；二是诗学研究；三是考证古籍中的错讹；四是诗词创作。四者相辅相成，反映了周先生治学的不同层面。那么，周先生是如何将四者融为一体的？我以为，有四点值得注意。

其一，周先生胸怀广阔，有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的坚定信念。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之说，周先生一直以此相激励，将其奉为人生圭臬。如周先生在《〈离骚〉浅释》中的论述道：“今日言楚辞诸家，各执一词，或主遭忧，或言离愁，或持牢骚说，此皆于汉有征，……然持此非彼，窃所未安。谨案：昔人解易，一名而有三义：变易、不易、易简，传为通谈。细绎史公全文，‘离骚’一名，不妨统遭忧、离愁、牢骚之三义：自怨而生，所发者为牢骚；怨自何来，则遇谗见疏，亦即遭忧作辞之说；战国士风，朝秦暮楚，楚材晋用，习以为常。原才士见斥，本可去之他国。而楚为宗国，原为世臣，义难轻别。忧之核心则为欲别而不忍别、不能别，此又可为离别之忧作注脚。三义相辅相成，……正不必是一而非二也。”在这里，“忧之核心则为欲别而不忍别、不能别”等语，虽然是在解说《离骚》，但完全可视为夫子自道，周先生从来没有因为“见斥”产生怨怼，相反，一直以屈原为榜样相激励，相信那些小丑终究有一天会以反文化罪押上历史审判台，国家会迎来需要文化的春天。

其二，周先生有深厚的小学功底，治学上承章黄学派，能在娴熟地运用训诂、文字、音韵等知识的过程中，从版本入手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如周先生的学识曾引起章黄学派的后学洪诚、徐复等先生的关注。如徐复先生有“晚稽校疏，无与伦”^⑤语，高度地赞赏了周本淳先生的小学基本功。《震川先生集》是周先生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一部古籍校点著作，从时间上看，其开始校点时间很可能更早。如周先生在《震川先生集·前言》中写道：“这次校点以《四部丛刊》影印的康熙时常熟刊本为底本，原由汪旭初先生断句，因汪先生已经逝世，新式标点和整理工作由我进行，主要用玉钥堂刻本为对校本，除文中明显错字径改外，其余校改均出校记，附于每卷之后。”^[18]《震川先生集》实际上是由周本淳先生与汪旭初先生（1890—1963年）共同完成的。汪旭初先生江苏吴县人，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手不释卷，经史百家，无不研习。汪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等，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合称“章门四弟子”，曾出任《大共和日报》总编、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63年汪先生去世，因文献缺失，留下了诸多疑案。如周先生是否与汪先生有故？周先生接手校点是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请，还是应汪旭初先生之请？然而，不管周先生是应谁之请，当知他有深厚的小学学养。

其三，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读书，善于“把见到的想到的一些不同意见记下来”^[19]，造就了深厚的文史基础。如《读常见书札记》收录的考证文章涉及经、史、子、集等四部，如果没有焚膏继晷的精神，没有超乎寻常的阅读量是无法做到的。如程千帆先生评价道：“友朋中老学不倦如袁伯业者，先生而外，无他人也。”^[20]袁伯业，名遗，东汉人，袁绍从兄。曹操曾对袁伯业说：“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21]袁伯业以老而勤学著称，程先生称赞周先生时以袁伯业为喻，由衷地发出“先生而外，无他人也”赞叹之辞，生动地概括了周先生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精准地勾勒出周先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学人形象。

其四，诗词创作是周先生解决古代诗学问题的重要武器。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周先生出版了诗学著作《诗词蒙语》、编辑了《唐人绝句类选》、油印了《离骚浅释》，自费出版了旧体诗词集《寒斋诗录》等。在这中间，周先生独特的品诗和鉴赏能力成为他解决校点问题的重要法宝。如翻阅《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时，看到“独留奏章在人间”等诗句时，周先生立即认识到“‘章’当从《诚斋集》作‘草’，平仄始叶”（周本淳《读常见书札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再赘举。

⁵ ① 周本淳《寒斋诗录》，自印本，第35页。

② 见周本淳《寒斋诗录·哀三女小华》，自印本，第36页。

③ 徐复《赞》，周先惠等编《我们的父亲母亲——周本淳钱煦追思录》。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莫砺锋先生在江苏古代文学第一次理事会上谈到周先生时，他专门举例说明了《读常见书札记》一书的学术价值，认为这本不厚的著作解决了古代文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份量超过那些砖头厚的研究成果。莫先生的一席话，引起在座五十多位知名学者及教授的共鸣。改革开放初期，周先生应程千帆、孙望等先生的邀请，先后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研究生授课，讲授诗学和小学。长江学者程章灿教授谈起听周先生授课的感受时说：“周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不可多得的学者。他的诗词创作能力为他深入地研究唐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如今，这些侍坐者大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蹈先贤之辙，续今日之华章。苏轼拜谒淮阴侯韩信庙以后，写下了“书轨新邦，英雄旧里”（苏轼《淮阴侯庙记》）的感慨。我真诚地希望，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周本淳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榜样，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无怨无悔地添砖献瓦。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不著撰者.清史列传 [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4404.
- [3]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 [M].向新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
- [4] 王钟翰.点校序言 [M] //不著撰者.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
- [5] 曹丕.秋胡行 [M] //张强解评.三曹诗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40.
- [6] 戴名世.方灵皋稿序 [M] //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54.
- [7]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M] //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114.
- [8]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M] //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
- [9] 董正位.归震川先生全集序 [M] //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4.
- [10]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 [M] //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8.
- [11] 刘大概.论文偶记 [M] //舒芜校点.刘大槐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
- [12] 姚鼐.述庵文钞序 [M] //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1.
- [13]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 [M]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4] 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前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
- [15] 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前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 曾国藩.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M] //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486.

[17] 李鸿章. 李鸿章家书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2: 53.

[18] 周本淳校点. 震川先生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